

國立復旦大學圖書館惠存

田顧錄

第二冊

鄒魯自署



回顧錄 第二冊 目次

卷三

二十一、內憂外患·····	三一七
二十二、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上）·····	三八三
二十三、辦理國立中山大學（下）·····	四〇八
二十四、教育改革計劃·····	四三三
二十五、團結抗日·····	四五四
二十六、出席世界大學會議及梅德堡大學五百五十週年紀念會·····	四六四
二十七、發動抗建·····	四七七
二十八、返校主持·····	四九四
二十九、賀問國際聯盟·····	五〇六
三十、武漢淪陷前漫遊四川宣傳·····	五一五

卷四

- 三十一、因職因病四辭中大校長……………五二七
- 三十二、臥戰發生後著「舊遊新感」……………五四八
- 三十三、戰禍酷烈提供永久和平原則……………五六三
- 三十四、內政外捷之新局……………五七八
- 三十五、鄉居生活……………六〇二
- 三十六、內外堅苦奮鬥中完成抗戰勝利……………六六一

二十一 內憂外患

「中國國民黨史稿」編就交民智書局付印後，馮玉祥先生派代表王鴻一先生到上海來見我和其他同志，說馮先生很願意和我們會談，堅請我們前往河南新鄉一行。

當時在上海的同志，都懷疑馮先生是共產黨，頗不願與之接近，因此對馮先生的約請，表示猶豫。我却以為要知道馮先生是否共產黨，不可全憑道聽途說，最好是當面開誠佈公一談，才下判斷。於是我便前往河南新鄉會馮先生。

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很坦白地對他說：「我是革命黨人，我相信你也是革命黨人，我們的態度應該光明磊落。在談論一切問題之前，我想先問你一句話，希望你以革命黨人的態度來答復我。」他連說：「當然，當然！請你說，請你說！」我便接着說：「我要問你是不是共產黨？」他說不是。祇因他曾經到過蘇聯考察，和蘇聯人士及共產黨便有往來，因此引起了這種無稽的謠言，其實並不是共產黨。於是我住了幾天，彼此談話感情十分融洽。

談後我由新鄉赴天津，就在那兒住下。在這個時期裏，我編好先父先母的事略，遂將胡漢民先生為先父所作的序，及江瑛、高超兩先生為先父七十一歲所作徵文序，均用楷書寫成冊頁。當時我不過問一切政治，因此有

朋友寫信來問我，為什麼態度這樣消極。我覆了他們一封信，大意說：「自中央特別委員會解散後，我決定抱着暫時不問政治的態度，好讓中央專心去做。在環遊世界的時候，我看見強盛國家的國民，在國外處處佔着上風。於是到了法國之後，我便寫信給在上海的同志，叫大家讓現存中央的人去壟斷政治，不要擾他。目前還是這樣。因為一國政治的改進，決不是短時期內所能見功。假如不到時候，就責備人，未免近於衝動，實非福國利民者應持的態度。」

在天津住了不久，我覺得那兒終是個是非之場，決定前往日本。到後我選擇一個很清靜的地方——箱根的強羅——住下，每天讀書寫字，逍遙自在。那時我溫習完了一部「賈治通鑑」，還臨了幾次石鼓文，復應許多日本人的請求寫字繪畫，高興時則吟詩。這兒且錄兩首，以見我當時的閒情逸興：

「山居何所親，花木與禽禽。觀之色紛紛，聽之音嫋嫋。來去紙白雲，履履不相擾。偶來居停間，辭以語不曉。」

「觀山復玩水，凡百莫擾余，清心多妙悟，無事自寬舒，倦臥飢乃食，晨興夜即居，連天風雨急，閉戶讀古書。」

這樣陶醉在大自然裏，一切俗慮都蕩盡了。有些關心我的朋友，見我好像「無懷氏之民，鳥天氏之民」一樣，都寫信責備我，說我軟化。我因用櫻桃汁畫成一幅菊花，並題一首詩答復他們：「摘取櫻桃作紫紅，染成秋菊付飛鴻，好教心事傳將去，猶是稜稜傲骨躬。」

不久，東三省發生中俄事件，就是歷史上所稱的中東路事件。我靜止的血液，復沸騰起來，便離日回國。臨行的前一天，適居正先生寄了一包玉版宣紙來，我就在一日之內，畫成蘭花百幅帶回；題曰：「載圖言歸」。當時我由釜山搭火車，取道朝鮮到東三省。坐在車上，最使我難堪的，就是所看見的日本軍官，都是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他要怎樣，就是怎樣，誰也不能過問，更說不到干涉。沿途我看見許多朝鮮人民的痛苦情形，深深印上亡國奴不可做的烙印。那時曾成詩多首，以誌觀感。到了瀋陽，我就用化名送給某報館。次晨，該報館把他都發表出來，但是有關涉日本的字句，不是改過，就用××符號來替代。我看了之後，非常憤慨，想到東三省還是我國的領土，而人心先死，恐怕難免很大的危機；且報紙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尤不應該如此。於是我寫信給該報館，教訓了他們一番。現在摘錄一首於後，俾國人知道朝鮮亡國後痛苦的大概情形：

「車從釜山發，北向京城行。沿途見民舍，最足動我情。東斜復西倒，荒蕪雜棘荆。茅茨殊不治，四壁塗泥成。寬廣不數丈，支持之一椀。蕭條空無物，亂草肆縱橫。牛馬同寢處，鷄鶩共益羹。山河雖信美，居者不聊生。禾麥離離實，耕者不得烹。（古詩烹穀持作飯烹字本此）此情一何慘，哀哉亡國民！」

在瀋陽，我住的是一家僻靜的旅館，房金每天祇五角，飯由旅館買來，菜是自己燒的。那兒我的朋友中，過從最親密的是羅文幹先生。他看見這種情形，很為嘆異地說：「你廁身政界三三十年，竟能安於這種生活，真是難得。」

我旋往見張學良先生，表示此來係因中東路事件，願往前線觀察對俄戰事。張氏堅決拒絕，並說：「他人可

去，你獨不可去。」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回旅館後，羅文幹先生來訪，我便問他原因。他解釋道：「因為傳聞楊密有資格拿你，假使發生意外，恐怕外人要說他故意想出花樣，貪此賞格，所以不肯讓你去。」羅文幹先生並力勸我住在瀋陽的日本區，以防萬一。我却沒有接受他的勸告。但是我聽了羅文幹先生所說「秘密有資格拿你」那句話，生了很多感想，因為五古一章：

「猛虎在深山，勢令百獸懼。蛟龍潛海中，時有雲氣接，聲威足驚人，牛後真臣妾。平生重意氣，豈為好游俠？自有霖雨懷，濟川作舟楫。頭顱價十萬，所到人駭懼。終當起棟樑，寧忍甘同壓。」

當時人家曉得我被緝拿，有的就為我抱不平，說我從事革命數十年，成功後不但沒有享受到應有的權利，還要被緝拿；而一班反對革命的，却不少是高官厚祿。我聽了對他們說：「我是為救國救民而革命，不是為高官厚祿而革命；否則機會很多，那兒得不到普通人所希望的一切。至於人家反革命的反得高官厚祿，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了。」並成左詩一首示之：

『聞盡滄桑百感平，由來世態反人情，養鸞尚不衣羅綺，飽飯何曾事種耕？參差孔竊原有例，顏跽跼壽莫相驚。君將歷史從頭看，消長機樞總可明。』

我在瀋陽，空的時間很多，開了就到書店裏去消遣。因此那兒大小書店，都有我的足跡。但是結果很失望，因為那兒的書店和圖書館，不但不見有價值的古書，也很少新時代的書籍，一切還不如朝鮮。我對於東三省的文化前途，極抱悲觀。

張學良先生雖然不願意我赴前線，却送車票和旅費來，說我可隨意遊覽。我辭謝了他的車票和旅費，自己拿錢去買車票到各地遊覽。向來我坐火車趁輪船，總是提早去的；可是那次到了臥車上，同房的已先到了兩人。他們正談得高興，我聽見一個人問：『少帥比老帥玩牌的興趣怎樣？』另一個答道：『少帥的興趣，不減老帥，只要有人和他玩牌，他就很高興，而同玩牌的人，都是想湊他的高興，只望輸，不望贏，他益贏得高興，你的差事益派得好，他從不辜負你湊他高興的一片心。』一人又問：『某人（不明別號所以未知究係何人）賭品如何？』那人又道：『某人算最通融，每天只要千元左右到手，不論四圈八圈，就不打了，讓我們真正賭輸贏。我們預先約好，在四圈八圈以內，輸足千元，大家平均担負，以後再打，才講輸贏。』一人又問：『如何能够一定輸呢？』那人又道：『自然另請一位在他後面看牌，他要什麼，就打什麼，那有不輸的道理。』我正聽得有味，忽然車開了，他們也不再說。我想像東三省那得不糟呢！

這次我的行程，係由瀋陽出發，經吉林直至齊齊哈爾，再由齊齊哈爾折回瀋陽。然後才遊瀋陽各處。這次遊歷中最使我覺得奇怪的，就是長春車站南滿鐵路的鐘，比北滿鐵路的早一小時。據聞日俄戰爭時，約定時間開戰，日本早一小時攻擊俄國，以致俄國失利。後俄實日，日云她的鐘點已到，所以長春車站南站至今較北站早一小時。日人的信義，大都如此。

東三省地方甚大，寶藏至多，出產極豐，因此分區計算，成為我國對外貿易出超的地方。可惜人力不加，曠土甚廣。我想：我已不欲在政治上和人競爭，不妨在此經營實業，不過想經營實業，就須回到關內，籌集資本。

那時中俄的戰事正緊。但是不見中央派兵來增援。有人說東三省的當局拒絕中央派兵前來；有人說中央不願派兵增援。我想這種傳說，不論孰是孰非，都不是中國之福。於是我決定趁此時機，入關一行，一方面看看關內的實在情形，另一方面則籌集些資本，來到東三省辦實業。這樣我便乘京奉車返天津。

適逢馮玉祥先生率領第二集團軍，聯合閻錫山先生對中央作戰。馮先生有個親信，請來天津，邀我前往，正在車上遇着。我問他：「此次你來，是馮先生的意見呢？還是閻先生的意思呢？」他答：「是馮閻兩先生的意思。」我又問：「這次用兵的意義怎樣。」來人說：「中央無緣無故與蘇聯鬧出亂子，出了亂子，又不派兵出關抗敵，祇是天天要裁異己的軍隊，排除異己的人才，迫不得已，才有此次的用兵。」我心中想，中央不出兵抗敵，在關外所目睹的，也許中央有他的主張，至於排除異己，以我而論，是個已經放棄政治活動的人，聽說還隨時注意我的行動，不過國家才統一不久，又動干戈，終非國家與民衆的幸福，心裏極是難過，若趁這機會能有裏面化干戈爲玉帛，豈不更好？於是又問：「馮閻對中央的指摘，就是這些嗎？關於他們的政治主張又怎樣？」來人說：「就是要請你去商量。」

我到了太原見馮閻兩先生後，就把「黨權歸諸全黨和訂定基本法與民共守的原則。他們都滿口應允。當時在鄭州作戰的祇有馮先生的軍隊，閻先生只負接濟餉械的責任。雙方戰事正烈的時候，何應欽先生到了太原，閻錫山先生辭解中央。不久，馮先生的建安村寓所，就被派兵保護，馮先生出入也不自由。馮先生的軍事行動也就失敗了。

那時和馮先生住在一起的，大都他去。我也是和馮先生住在一起的人之一。在這種情形下，就有人勸我離開建安村，甚至天津亦有人打電報來勸我。我答覆他們說：「朋友之義，在安樂共享，急難共受。我那能在此時離開？」馮先生見我不走，對我更加客氣。從此我們的友誼就更深了。我住在山西的時候，成晉遊感事詩一首如左：

「瀛海歸來興尚濃，又從代北記遊蹤。太行東走關山壯，汾水南迴險阻重。詞術晉文羞創霸，戲言唐叔謝初封。蒼茫感念今古，立馬山頭數亂峰。」

民國十八年秋，閻錫山先生準備對中央興兵，馮玉祥先生也贊成，且和唐生智先生約好，取一致行動。馮閻兩先生要我赴東三省晤張學良先生，請他合作。

十九年元旦，大風大雪，我從太原動身，經雁門關赴遼寧，既到瀋陽，就約張晤談。有一天，深夜十二時，張派人派車來約見。那時我患感冒，帶病冒寒前往。這是因為張每日早晨始就寢，下午四時左右才起床，非深夜不能見客的緣故。

我們談話的房間隔壁，一陣陣的興高彩烈的聲音，由隔壁斷斷續續地送過來，好像在舉行賭會模樣。我們談了約一小時完畢。我對張所說的大意是：「我希望你幫忙的很簡單。因為你處於強鄰逼迫的東三省，對國內政治祇要不偏袒何方，守着中立，把中國的國土保護得好好地就完了。我對內政的改革固切，而對強鄰的逼迫，尤為注意，所以希望你這樣。」張贊成我的意見。

但是他的生活情形，引起我無限的感慨。談話歸來之後，情不自禁，就秉夜揮一長函致張氏，略云：「東運省北俄南日，虎視眈眈，即使勵精圖治，鞏固我國，尚不敢忘其無事。今先生身膺疆寄，不知注意國防，惟縱情於聲色犬馬之樂，起居無節，號令不時。弟與先生交情雖淺，但爲國家前途計，終不敢緘默無言。尚望先生能及時努力，振作精神，負起捍衛國家之責任。不然，一旦變起倉卒，將何應敵，固我邊圉，東三省一失，藩籬撤盡，國家不免受累，先生詎能免於國人之指斥乎？」

信成，昏然入睡。翌晨，羅文幹先生和湯爾和先生來訪，看見桌上有致張氏的信，便問我爲什麼事寫信與他。我說祇是一封忠告的信，可以公開閱覽。他們看畢，羅先生以爲張係貴介公子，年少氣盛，與實無益。湯氏則以爲或可動其天良。我因書已成，也就送去。不久得張親筆覆信，說讀過我的信後，深爲感動，願意從此改過留新。當我離開瀋陽的時候，知道張氏依樣葫蘆，我就料到東三省難免發生不測了。

我往東三省的時候，唐生智先生已單獨起兵，反對中央，但不久便告失敗。我從東三省回到山西，閻要起兵，已約集汪派人物在一起。大家都以爲張學良先生能够信守諾言。那時汪本人還沒有來，先派陳公博來接洽，大家都感覺到應速成立黨部，以資號召。汪的一派人主張以在粵開會的第二屆執監委員爲基本，把我們附加進去；我則以爲自特別委員會被推翻後，黨統已不復存在，因主張根本打破黨統觀念，就事實而謀全黨的團結。因爲全黨果能團結，外侮尚不足懼，當時我曾撰黨統問題一文，闡明我的主張。

及汪北來，表示接納。那時閻都已經和平接收平津各機關。民國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我們就在北平成立擴大會

產生政府。同時反對中央的戰事也就正式爆發。黨的方面，我們主張以黨權還諸全黨，所以預備召集四大大會，政的方面，我們主張以政權還諸全民，所以急急成立約法起草委員會，擬訂約法。

擴大會議和政府相繼在北平成立後，剛剛一星期，各部人選還沒有決定，張學良忽統兵入關。當時關馮軍隊都在前方，後防空虛，形勢危殆，擴大會議等就由北平遷至石家莊；而中央軍隊正由平漢路北攻，復由石家莊遷至太原。

擴大會議遷到太原以後，繼續擬訂約法草案。不久草案擬成，全文有八章二百一十一條（註一）。約法起草委員會將約法草案提交擴大會議。擴大會議通過後，便將草案發表，並宣言以三月為期，徵求全國人民真實意見及正當批評。宣言中指示約法草案的基本精神說：

「中央黨部披閱草案，詳加核議，認為草案全部，實能恪守總理遺教，適應於調政時期之設施。蓋草案全部，以「建國大綱」為綱領，而根據之以定條目。「建國大綱」注重於滿足人民之需要，訓導人民之智識能力，使之能自決自治；故草案於人民之自由權利義務一章，詳為保障與規定，使能自動的完成個人之人格，而担当國民之大任。建國大綱，注重於以縣為自治單位，及中央與省之權限，探均權制度；故草案於國權及中央制度地方制度諸章，悉準此旨以為釐定。務期掃蕩十九年來軍人主政與割據地方之惡習，及使人民得自行使直接民權之根據。此外更依據總理遺教，見諸建國方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者，訂為教育、生計兩章，以期養成民德、民智、民力而馴致於民生主義實行之域。」

此次草擬約法時，有一部份人因爲軍事不利，就未免灰心，有一部份人對於約法，本來沒有多大興趣，所以此次約法之成，自始至終，我是最努力的人。及至前方軍事失敗，閻錫山先生表示再無法維持，擴大會議無形解散，大家離開山西，我纔和謝持先生間道共到天津。

我從太原到天津那天，大公報剛剛把約法全文登出，並發表了一篇社論，批評約法。指出草案的優點有五，可疑之點有六。我爲解釋大公報的疑點起見，立即寫了一篇「解釋約法」。次日大公報把該文發表後，我這覺得意猶未盡，又用同樣的題目，再寫了一篇，仍送大公報發表。

施行法治，向來是我的主張。草擬約法，以完成訓政，實現法治，則是我的願望。現在約法草案完成了，報紙也把牠發表了，並且有批評和解釋的文字，可見國人對於牠的注意。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覺得更應當努力，務須把約法草案的真義，使國人完全瞭解。因此我又寫了一篇「約法說明」（註二），把約法內容，分章逐一解釋。自從這篇文章發表後，而國人對於約法草案，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擴大會議結束後，我曾發表「治亂之機」一文，說明心平政平的道理。我說若中央政府能心平政平，爲黨國遺囑，使中國能強盛，即爲一國民，亦至榮幸一。

不料二十二年二月，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先生被軟禁於南京。消息傳出，各方譁然。我也不能再保持緘默的態度，就由天津回香港。各方到港的人已不少，大家和廣東將領陳濟棠先生等，洽商分救對策。結果決定首先由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古應芬、蕭佛成先生等提出彈劾；接着於民國二十二年夏在廣州成立中央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我

被推爲中央黨部委員及國府委員。

後來稱廣軍政同志，均主張武力解決，推我北上和閻馮及北方諸部聯絡。我由香港動身，經大連到天津。那知日人竟大表歡迎，尤其是少壯軍人士肥原之類；當我到天津後，租了一間房子在日租界，搬進去時候，尚未坐定，土肥原即來訪，更請他坐位，門前步槍機關槍的聲音驟起，我即叫人出外看是什麼一回事，土肥原笑道：「先生新搬進日租界房屋居住，特叫士兵在門前演習，表示歡迎。」說畢繼續談話，許多恭維，嗣後在天津的日本人頻頻來訪，有一次且開甚大的歡宴會，叫了許多舞女來助興，我對日人，素來認識他們侵略的傳統觀念，以及挑撥離間的慣伎，這次雖然知道他們存心不良，却不明白他們的葫蘆裏究竟是什麼藥。一天，土肥原竟對我表示：「張學良整天在烟賭場中，什麼事也不管，對於中日兩國防俄防共的戰線上，有很大的危機。我們準備擁護你主持東三省，把張學良趕走。你是西南人，我們認爲最理想最合適的」。我立刻嚴詞拒絕他，並且警告他：「稍有智識的人，決不願出賣民族國家。至於張學良，他是我國的官，行爲如何，我們自會處置。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政治良窳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用不着你們來過問，至那兒的主持長官，更輪不到你們來擁護。」但是我心中默想：日本人對於東三省，顯然有進一步的打算了。

雖經我這樣嚴詞拒絕，但是土肥原及駐天津的日本領事和政客軍人，仍時來糾纏，土肥原並兩三次帶了什麼東三省蒙古會黨的領袖來見我，有一次更同了白俄領袖前來，無非說這種人都可擁護我主持東三省的話。我深知日人侵佔東北的野心，至此時已成弦上之矢，待機而發，便再向他嚴重警告，不要對於我國的領土，妄想染指。

我說：「中日是亞洲僅有的兩個大國，應該互相協助，共維亞洲和平，不該互相殘殺，就事實而論，偌大的中國，斷不是日本所能吞下的，互相刺繡的結果，只有兩敗俱傷，這固是中國的不幸，也非日本之福。」從此「肥原等知我無法利用，以後也就來往漸疏，到別處去打算了。」

日本侵略我國的野心，不久就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張學良不抵抗，東三省便被日本所佔有，以後土肥原也從天津挾着鐵艦赴大連，預備組織傀儡政府。

「九一八」事變未爆發前，中央及廣東雙方都已準備軍事行動，並各積極籌備召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雙方都感覺到國難的嚴重，本黨同志應及早團結，共禦外侮。中央并即派人南下接洽，結果決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互派代表到上海開和平會議。廣東方面的先決條件是恢復胡先生的自由，並以十九路軍擔任京滬路的衛戍職責。中央都一一答應。於是和平會議，就於二十年冬正式在上海開幕。我被推為粵方代表之一，由天津乘津浦鐵路南下參加。

和平會議開幕後，即將雙方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的中央委員，合併為一，而汪氏在上海大世界所舉行的國全大會，另外選出中委十人，亦許一體合併，但中央方面因之多選中委十人，以期平均。在和平會議中，南京代表中有人說蔣先生表示願辭去黨、政、軍各職，專任監察院院長。我聽了非常高興，以為蔣先生的態度，真是光明磊落。但是廣東方面沒有同意。我仍堅持自己的立場，以為中央與廣東合作，是完完全全的團結親善，蔣先生願辭去黨、政、軍一切責任，專心於監察院的職務，確是最誠懇的合作表示。如若要他完全下野，可說沒

有理由。因為既是團結合作，就不該再分彼此；否則你上台的時候，我打倒你，我上台的時候，你又來打倒我，循環報復，國與民均受其害。所以我認為主張蔣先生應下野的，簡直等於造成將來紛爭的根源，而在外侮日增的情形之下，不該有這種現象，可惜我的主張，終沒有實現。結果蔣先生離開了南京。

接着舉行第四屆一中全會，討論各院人選問題。關於立法院院長一職，大家仍推胡漢民先生繼任，並推我做副院長。我因同情蔣先生，覺得蔣先生沒有出來負一部份黨政的責任，終非國家之福，局勢仍不穩定，就堅決拒絕。他們以為我是代表廣東的，又和胡先生接近，胡先生目前決不肯就職，由我來接他的職務，最為適當，一定要我出來。我始終為同情蔣先生，不肯接受。遂由我推薦覃振先生接替，自己才能脫身。同時決議在廣州成立中央黨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代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就地處理西南的黨務政務。因為我沒有任立法院副院長，只任國府委員，所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都發表我為委員。

和會閉幕後，我仍住在上海。那時錦州問題，又十分嚴重，蔡廷楷先生和我商量，想請我協助他統率一部份十九路軍北上抗日。我認為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就立刻答應了他。同時大家要我担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一職，我以為目前尚可不問黨政各事，但是中山大學是總理叫我創辦的，我不能推却，便答應了。因此，我就辭職回廣州，就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一二八」事件。

因為十九路軍奉調他去，正在準備撤防，日本就想趁十九路軍的無備，一舉進佔閩北，重演「九一八」佔領遼陽的故技。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日軍突向十九路軍攻擊。十九路軍的將士覺得守土有責，奮起抗戰。這

就是所謂的「一二八」事件。

「一二八」事件發生後，中央欲避免敵人耳目，顧慮國際形勢，除令第五軍配合作戰外，宋館積極增援；而民衆方面，却盡了最大的努力。十九路軍的將領特地把這種情形，向我報告，並請我設法維持。那時中央政權和軍權實際上由蔣先生負全責。我認爲抗日大事，中央不應不盡量接濟。如是我心上，就發生變化，因此，我與廣東就中山大學校長職時，沿途所發表的言論，都對中央不滿。我覺得唯有抗戰，才能遏止日本再進一步的侵略；唯有抵抗，才能引起世界輿論的正義感和友邦的同情心。在我到了廣州之後，就再三設法接濟十九路軍。但是不久十九路軍終以孤軍奮鬥而失敗。

我回到廣州，一面担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一面又任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會的常務委員。當時最感乾到困難的，是胡漢民先生不能在廣州主持黨務政務，而鄧澤如、曾佛成先生等雖極熱忱，却以年老，不能多處理各事。西南各省的事，固有西南各省當局負責，但照例請辦的事亦不少，尤其是外省來接洽黨政的，更集中於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這樣，一切便擱在我的肩膀上了。

這時接連發生許多痛心的事情，迫得我不得不時發出不滿於中央的言論。起初潘陽事變，張學良不抵抗而退，把東三省的錦繡山河，拱手讓人，當時中央說是倉猝無備，我們都很原諒。但是馬占山崛起黑龍江，屢予日軍以重創，而中央仍未赴援，卒致失敗。繼之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南京舉行時，日軍正計劃襲取錦州，我們認爲錦州一失，關內便要受到威脅，因此堅決主張必須速派勁旅去死守。當時曾決議：（一）極力